

从革命到调谐

——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发展历程及经验

武靖国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江苏 225007)

内容提要:税收不仅是筹集财政收入和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亦是协调利益分配、联结国家社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税收都发挥了特定作用,由此形成的税收思想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传承和启示意义。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经历了革命税收观、利税并行观和经济税收观的变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一种全方位税收观初见端倪,它要求税收在发挥固有职能的同时,强化其调谐社会的功能,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体、社会各阶层间的有机联结。这应是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史 税收思想 税收职能 国家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8-0035-12

一、引言：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税收脉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三次革命,每次革命都伴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税收不仅是筹集财政收入、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也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关于税收功能定位的认知和理解,构成了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体系发展的关键线索与重要脉络。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生产关系在国家政权与社会(及其个体)之间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影响国家治理

的关键变量。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基于不同学术立场、价值判断和问题研究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如黑格尔的国家至上范式、洛克的社会自主范式、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一体化范式等(李诚,2020)。相应地,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等不同的治理模式。不过,在中国历史与现实情境下研究财政特别是税收问题,需要将国家社会关系从“非此即彼”“此强彼弱”的对立思维中摆脱出来,更多地从两者间的总体性、有机性勾连的视角来进行观察。进一步看,国家社会关系在政治(或法律)上,指的是国家与社会间在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方面的配置;在经济上,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或产权)的配置。在这里,“国家”主要指的是政府或者其他履行公共责任的组

[收稿日期]2021-06-06

[作者简介]武靖国,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理论、税收征收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重点课题“社会整合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变迁研究(2021ZDKT002)”的阶段性成果。

织;“社会”可以具象化为公民成员个体以及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组织而成的共同体。从问题研究需要看,国家社会关系又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国家与个体的维度,这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主体。二是国家与经济体的关系,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主要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一关系主要指的是政治权力与责任在政府组织内部的分配,其关系到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国家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包括税收在内的所有财政汲取方式,皆代表着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态。在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封建式国家社会关系中,下级通过向上级输纳贡赋、承担劳役的方式履行义务,上级则对下级承担相应的安全保护、权利认证等责任。到现代社会,人身自由与个人产权成为基础制度,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责任、权利义务设置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现代税收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核心关系链条。相对于其他财政汲取方式,税收不但在汲取效率方面,而且在社会整合方面也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现代税收立法过程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沟通交往以及公民参与的结果,这种理性沟通为社会共识的形成提供了途径。而且,通过税制与税率设计可以对不同阶层进行选择性的激励,从而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彻底打破旧的国家社会关系、构建现代化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使命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这也意味着旧的财政汲取方式退场以及以税收为代表的现代汲取方式的不断发展完善。财政社会学观点认为,税收在财政汲取体系中的地位与国家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相应地,中央又提出要“进一步增强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①。在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代制度体系中,税收正在前未所有地突破传统经济学定位,在其功能设定上越来越明显地具备政

治与社会学意蕴。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使命以及税收思想变化过程,总结百年来中国社会整合进程中税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经验,可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二、党的税收思想发展历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的税收思想是其总体指导思想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阶段鲜明体现了党对社会性质、主要矛盾、自身执政目标以及革命建设战略等重大问题的深刻理解和理想化建构。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对税收工作的领导是直接和全方位的。但党的税收思想的核心链条主要有一个,即税收功能的设定。这一设定的变化,与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以及党对经济社会规律的认知把握密切相关。党关于税收工作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正式文献中,在早期主要是重要会议通过的宣言、决议案以及多次发表的关于时局的主张,解放后主要是历次代表大会主报告以及若干次全会通过的决定。特定时期主要领导同志关于经济、财贸等工作的讲话、文章甚至批示,亦对税收工作指导理念以及政策调整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对党的税收思想发展过程的探究,将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时空背景,以党对税收工作的功能定位为主要线索,以党中央和主要领导同志关于税收的论述为主要内容,力图梳理出党的税收思想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壮阔历程。

(一)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税收观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官方意识形态,由上层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基层宗法家族组织共同构成的“宗法一体化结构”(金观涛,刘青峰,2011:7-12)。作为维系这种结构的经济形式,人们向统治者所承担的贡赋与劳役,是“基于王朝体制下编户齐民对君主的臣属关系,由这种臣属关系产生出的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刘志伟,2019:23-24)。这种结构是在古代中国独特土壤与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顽强生命力和自循环特征的社会整合机制。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化冲击、经济渗透和军事侵略下,“宗法一体化结构”陷

^①这一论述的正式出现,是在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12月24日正式公布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中办、国办在2018年7月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和2021年3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均延续了这一论断。

入崩解。至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与乡绅阶层合流的“军绅政权”(陈志让,2008:34)。封建割据势力间的劣性竞争,促使其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进行暴力攫取,导致土地向依附于封建军阀的土豪劣绅大规模集中以及自耕农大量破产。军阀战争持续不断,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分裂、社会断裂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的整合和秩序成为这一时代最强烈的需求,实现国家统一与独立成为最迫切任务。

针对危机,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与社会整合方案。由于该纲领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特征,这一时期的税收思想亦呈现出鲜明的革命性,其基本主张是要废除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阶层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赋税制度。在1922年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当时的革命任务及奋斗目标,有两条涉及税收:“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1923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中又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制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总体看,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税收主张有三:关税自主,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封建性质的田赋、厘金及一切苛捐杂税;建立累进税制。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试图将其官僚机构渗透至各个层次以完成社会整合。但由于自

身及时代局限,其不但没能成功统合地方军政割据力量,而且在对农村的控制上采取了传统的保甲手段,致使乡村出现了基层治理骨干“逆淘汰”的现象,“保护型经纪”被“赢利型经纪”甚至“掠夺型经纪”所替代^①。农村阶级冲突进一步激化并成为革命策源地。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在根据地,除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外,还废除国民党政府、军阀和土豪劣绅征收的苛捐杂税。如1928年7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及《暂行税则》等文件中,均提出要“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的革命性不仅体现在对掠夺型汲取体系的彻底否定上,亦体现在建政过程中对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追求上。在全社会实行一种“统一累进税”(以下简称“统累税”),是相当长时期内关于社会改造的重要主张。其主要思路是:把农业、工商业等所有从业者纳入同一个经济收入标准来衡量,然后构建一套累进税率以实现税负公平承担。如上所述,早期重要文件多次提及统累税主张。在根据地建设中,将统累税思想付诸实践。到1932年,中央苏区形成了较规范的农业税与商业税税则并分别推行了累进税率。当时税则规定,一般农民的农业税起征点为三担,税率为4%至16.5%,富农起征点为一担,税率为4%至20.5%^②。总体上,贫农、中农的负担比例不超过总产量的10%,富农达到20%左右^③。但由于根据地政权不稳定,尚无机会将农业与工商业在税制上统一起来。抗战时期,统累税在根据地得以推广。1941年—1943年,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将农业税、工商税、财产税等合成一种税,采取累进税率征收。如晋察冀边区将村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田赋等三种主要税收和其他杂税合并一起,将居民的财富收入核定为“标准亩”或“富力”作为征税依据(周祖文,2017)。

综上,革命性、公平性构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及实践的特征,这与封建半封建的财政汲取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明清时期王朝与编户之间的人身控制关系已有所弱

①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一种是“国家经纪”或“赢利型经纪”,即代理人在征收过程中截留一部分税款作为费用,这些代理人一般是被国家权力所利用的,在一个不断商品化的社会中没有合法收入的职员如吏役等;另一种是“保护型经纪”,即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赢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是掠夺者)打交道(详见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7—40页)。到20世纪20—40年代,华北地区农民的税捐和摊款负担进一步加重,而且税收是在农村普遍半无产化过程中强征的,给自耕农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压力。“地方豪霸”与“村级恶棍”成为政府汲取财政收入所依赖的对象,代理人的掠夺性进一步增强(详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298页)。

②冯田夫,李炜光.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③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77—80页。

化(刘志伟,2019:335),封建财政义务履行方式的货币化走向甚至被认为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以完全人身解放与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社会关系仍未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把国家层面的“救亡”与个体层面的“解放”紧密统一,实际上是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党组织动员能力的有效性,彻底摧毁旧的国家社会关系,重新构建一个广大人民享有广泛政治经济权利的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及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具备了现代色彩。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税并行观与政企关系探索

解放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上下贯通、集中高效、便于发挥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①”,这种社会结构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全部经济社会生活都由国家来统筹”^②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抑制了个体积极性与社会活力。理论上,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后,以私人产权为基石的税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由于高层决策者较早意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在激发社会活力与个人积极性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税收在社会运行和国民经济中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

1.税收职能开始转向经济领域,但革命税收思想仍然延续。从国家建设的逻辑看,革命任务完成后税收应该恢复其调节经济与社会的基本功能。解放初期,面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以陈云、薄一波为代表的中央经济工作者有意识地运用税收手段来稳定国民经济并取得良好效果。但建国之初中央对税收功能的定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服务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③。这一时期的税收政策采取了按经济性质区

别对待的策略。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自1953年起采取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金和企业股东股息红利“四马分肥”的利润分配方法,增加了国家财政积累资金,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与此同时,对国营企业不征收所得税(但实行利润上缴制度)。为了促进合作经济发展,在农业税和相应的工商业税率上也采取了倾斜性设计。1958年后,受“左”的思潮影响,税收一度被当成抑制个体经济的重要手段。文革时期,税收制度被批判为“繁琐哲学”“条条专政”,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一度被否定。这一时期,由于“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单位制+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税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调节经济和社会的用武之地。

2.注重发挥税收在调整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的作用。计划经济时期,工商业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国营企业进行的。根据当时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很多人认为“国营企业的税收和利润是一个东西,都是工人群众创造的社会积累”,既然“在税收上经常考虑的公私关系已经不存在”^④,那么税收职能弱化也就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税收被定位为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的一种形式,税收制度不断被简化。但多次利税合一、以利代税实验的失败表明,税收在加强国营企业生产经济监督和保障财政收入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通过税收,政府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的销售收入、成本结构、费用情况、利润分配等财务指标,有利于对国营企业内部运转和生产经营进行监督。而且,税率调整可以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发挥奖限作用,这种激励作用在指令经济盛行的时代尤为珍贵。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企业上缴利润以盈利为前提。但工商税的计税依据不是利润而是销售收入或产品流转额,只要有生产销售行为,无论是否盈利,都要按一定比例纳税,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财政收入,同时也对企业改善生产经营形成了鞭策。总之,在计划经济时代,税收是少数几个能够兼顾政府指令强制性与企业单位积极性的调节手段之一,对于调节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发挥了一定作用。

3.税政统一思想有效实践,央地税收配置多次调整。近代中国,财权与税权的地方化是军阀割据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8-41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66-369页。

③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中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④梁尚敏,陈光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简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年,166-167页。

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即把统一税制和税权上收作为经济领域的主要决策。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提出,财政经济工作“应当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有步骤地走向统一”^①。同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中央委员会三次全会上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②。1950年1月,《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以下简称《要则》)颁布,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税种条例,实现了全国税政的统一。《要则》还对税收立法权做了明确规定,凡有关全国性的税收条例法令均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制定颁布实施,其施行细则由中央税务机关统一制定并经财政部批准施行,同时地方性税收立法亦要逐级报请备案或批准。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除了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业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税则、税目、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提交政务院决定施行^③。在全国税政统一,税权收归中央,主要工商税收收入归中央调度后,近代以来税权分散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央地间的财权税权配置问题亦浮出水面。央地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矛盾主线,其核心是财权税权集中到中央后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④。计划经济时代,财权税权虽然经历了几轮下放与上收,但没能很好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总体看,这一时期计划经济思维认知影响了党

的税收思想发展,也限制了税收职能的发挥。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再加上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积累,轻消费”,较低的个人收入以及有限个人财产,致使公民个体不可能直接承担财政义务,针对个人收入或财产征收的税种如房地产税、契税、利息所得税等要么停征,要么名存实亡。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单位制”特征使得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和流转税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政府与国营企业的关系成为税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

(三)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税收观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构建

改革开放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相应地,党的税收工作指导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计划经济时代,需要面对的主要是政府与单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政企关系被政府市场关系所涵盖。企业与职工之间由身份归属关系转向契约关系,计划经济时代被遮蔽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近乎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活力迸发所导致的新的社会分化,呼唤着新的社会整合理念与手段。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中央与地方这三个维度的关系,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强化利益共容,成为中央决策层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1. 税收调控经济思想的发展:政企关系转向政府市场关系。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尚未作好打破计划经济框架的准备,如何处理政企关系仍是中央决策的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做出工作重心转移决策的同时指出,要“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⑤。这种背景下,1983年—1984年进行了“利改税”,将国营企业履行财政义务的方式由单一工商税分解为11个税种。伴随着政企关系调整,十二大报告提出,要“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指导性计划的实现。但早期的“杠杆作用”仍然在政企关系的框架内,即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引导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合理计划生产经营行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十三大,改革的重点已由“扩大企业自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页。

③刘佐.中国税制五十年(1949—1999).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⑤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重要会议关于税收工作的论述,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权威选编资料。

⑥十三大报告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为此,要“运用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进行干预和调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主权”转向计划与市场的关系^⑥。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认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自此,经济体制改革正式跨越政企关系框架,进入了以政府市场关系为主的范畴,税收的功能定位也从政府嵌入企业的主要手段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税收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2. 税收调节分配思想的探索:现代性政府与个人关系破题。改革开放后,“单位制”外的非组织化力量逐渐增加。单位制无法容纳的新生人口及回城知青,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被推向社会的下岗职工,以及进入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构成了早期的个体经营者群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增强社会活力,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摆脱单位制约束的个体通过个人经营迅速积累财富,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并成为社会问题。在不能回归计划经济老路的情况下,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就成为党的税收思想的重要内容。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但同时又指出“当前分配中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十四届三中全会以较大篇幅对“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论述,提出要“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要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此后历届党代会报告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都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十七大报告提出“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3. 分税制思想的实践:央地关系不断优化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成为中央考虑的重要问题,推行分税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十三大报告指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十四大报告提出,要“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但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能力,出现了“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如何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实现央地财权事权划分规范化法制化,就成为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道重大课题。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均对“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进行论述。201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相继出台,在推进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法制化规范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税收功能定位的新内涵

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组织形式与交往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迁,相应也带来了城乡、地域、阶层间的分化现象。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分化对推进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但社会分化毕竟主要表现为社会的异质、断裂和冲突,放任发展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碎片化甚至秩序解体。如何对社会分化现象进行整合,从而走向思想共识、利益共容、行为共振,以实现社会有机化良性运行,就成为新时代党的重大使命。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既有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这种地域性分化,亦有阶层收入极化、阶层流动性固化等社会结构方面的分化,还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人际关系疏离,社会联结松弛,传统意识解构等后现代社会性质的分化现象。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进行了精准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也呈现出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意识和体

制,以增强党在调节经济生活、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冲突、领导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通过简政放权改革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完善法治环境来营造各种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承认和保护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市场体系下的利润分配权利。可见,党在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新形势,对既有“政党式整合”模式进行了扬弃式传承和升级型调整。这一方案保持和强化了其内核即党的领导,同时又强化了其在推进改革开放、引导社会发展中的既定航向。这一方案的运作模式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必须对重要的社会资源掌握有决定性的话语权。相应地,财政制度在治国理政制度体系中也必然占据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支柱”地位,从而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相应地,税收也被认为应该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支柱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这一功能定位是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理论实践的升华与总结,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要超越现有的“经济税收观”,承认和赋予税收更加强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属性:

1. 税收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习近平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①在税收领域,这种“系统性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发挥调节作用。习近平强调,要“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②实践中,通过“营改增”等一系列税制改革,健全了增值税征抵机制,消除了重复征税,对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了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提升了企业竞争力。通过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解决了征管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办税不够便利、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注重运用税收来解决市场失灵或负外部性问题。主要实践是环境保护费改税迈出实质性步伐,全面推进了资源税改革,“绿色税制”的生态补偿作用得到加强。三是注重税收在促进和维持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区域性、分经济性质的税收制度设计为“先行先试”提供了条件,但这种区别对待的税制具有阶段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全国统一的税制体系基本形成。习近平指出,“区域政策的一个要点是统一国内大市场,这既是区域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③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④。随着区域性税收政策淡出和慎用,税收在统一全国大市场中的作用得到体现。

2. 税收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作用进一步深化。进入新时代,在国家社会关系调整方面有一些深刻变化。通过对社会群体和机构的组织性嵌入和制度性吸纳,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强化转移支付和推进脱贫攻坚等工作,强化了区域、阶层和城乡间的有机联结。在发挥税收再分配功能方面,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税收政策的普惠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其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⑤在相关税制改革实践中,表现出了更加明确的包容性和回应性,即在政府、企业和个人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处理中,更多地“让利”于市场主体和居民个体,更快更充分地回应社会各群体的呼声。特别是减税政策由过去的结构性减税发展为结构性与普惠性并重。2018年以来,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的同时明确了

①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6日).人民日报,2014年6月7日。

②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③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④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多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针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与范围持续扩大。为了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自2016年起多次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将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2019年又降低了增值税税率。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中央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减税。

3. 税收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上,一方面强化了财权的中央集中,即明确“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明确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划分^①。当前央地关系的一个焦点是地方政府的财力保障或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重大会议文件中可看到,“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以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的普及,往往与国家社会关系或者政府个人关系的重大调整密切相关。从这方面看,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为地方政府寻找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是未来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三、党的税收思想发展的几点历史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虽对人类历史上的税收现象的性质有过若干论述,但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阶段财政税收问题提出具体设计。中国共产党的税收思想是其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独立探索、发展和完善而来,其间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多重交汇,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丰富可贵的。这些经验,既是党的税收事业发展的经验,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准确把握“人民税收”的本质属性,处理好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间的关系

^①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意志,自觉维护人民利益。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是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在此思想指导下,“人民税收”自然是党的税收事业的本质属性。

“人民税收”的内容是丰富的,它包涵了“党管税收、为民收税、向民收税、为民轻税、为民改革、为民服务、为民用税”(邓力平,2020)等多个方面。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发展历程可发现,在人民税收实现的方法论上,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保障人民享有广泛政治经济权利,是税收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发展史,很好地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即“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③。“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是国家制度设计和运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宁洁,韩桥生,2020)。这里的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就是本文所说的国家社会关系。现代税收的基本逻辑就是:国家承认、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广泛政治经济权利,人民履行包括纳税在内的法定义务。征税本身是一种财政汲取行为,存在消极不遵从现象是很正常的。但人民的权利体验越直接、越充分,其遵从税法的积极性主动性越强烈。解放战争期间,广大农民通过土改获得土地产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缴纳公粮和税收以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以产权换税收”的经典成功案例。其次,坚决依靠群众赢得人民支持,是税收事业发展的不竭源泉。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废除封建半封建性财政汲取手段、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赢得了民心。正是有了人民支持,党才能顺利构建“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冯田夫,李炜光,2006:149),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新型整合。再次,全心全意服从服务于人民利益,是税收事

业发展的核心要件。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组织在为人民事业和国家复兴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做得越好,透明度越高,税收的社会遵从度就越高。

进入新时代,我国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改革步伐骤然加快。这些改革一方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持续加强,减轻了市场主体和自然人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治国理政人民性的强化也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如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一系列费改税措施等等。一些比较敏感的重大税收改革,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改革,由于更多地涉及特定群体的具体经济利益,目前正处在攻坚阶段。这些改革要取得预期的成功,根据历史经验,更需要运用好、落实好人民中心价值观和群众路线。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1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在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税收政策调整过程中,倾听群众呼声,协调各方利益,形成社会共识,应是根本制胜之道。

(二)科学认识税收促进公平正义的功能,协调好各阶层各要素间的利益分配

早在成立之初,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价值追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除了对不合理的权力先占型所有权制度进行改造之外,运用税收手段消弥收入分配差距也被当作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党的统一累进税思想及其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实践探索,即使在世界财税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平正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判断。革命战争时期,根据不同阶级身份进行区别对待被认为是构建公平社会的必要之举;计划经济时期,公平正义被理解成经济收入上的平均分配。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和整个社会都逐渐形成了更加全面的公平正义观念,即国家治理的公平正义“不是某一个群体、

某一个阶层的公平正义,而是要让绝大多数人都感受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顾小璐,陈晓东,2020)。市场经济体制下,很难再用指令性计划来追求经济分配的整齐划一的结果。由于先天差距、资源禀赋以及各生产要素地位不同等原因,在初次分配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必然的,这也是财税手段被寄予调节贫富差距之希望的原因所在。但从国内外既有经验看,税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效果与人们预期之间存在落差。税收毕竟是一种间接杠杆手段,这决定了其作用方式一般是相对温和、渐进的,其作用与其说是“抽富济贫”,不如说是影响和引导经济行为预期,代表特定的社会价值导向。从这方面说,税收的这种相对柔和的调节机制,恰恰是其核心价值所在。如果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分配是一种结果导向,市场经济下以税收为主的调节机制更多地是一种过程导向,其所追求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平均化收入的结果,更是要增强一种不断走向相对公平的未来趋向的可能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到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位是“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各类经济主体以及自然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各类生产要素亦都在法律框架内有追求合理价值回报的权利。相应地,在税收制度设计中,不再根据身份、成份以及经济性质等进行区别对待,而是构建一套同时适用于所有区域、群体和经济主体的统一的税制体系。税制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税目选择性、税率累进性以及税收要素的调整,并不带有歧视性色彩,其目标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调节国民经济效率,弥补市场失灵现象。

从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走向和策略来看,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以下几个特

征:一是总体上以向市场主体普惠性“让利”为主。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特别是减税降费力度增强过程中,中央多次强调要惠及所有市场主体。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营改增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减税降费“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二是在一些焦点问题上循序渐进,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如针对数字经济、资本市场的税制改革问题,尽管有较高社会呼声,但由于牵涉到企业国际竞争力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等复杂问题,在决策中一直保持谨慎。针对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敏感环节,现在的主要措施是先通过信息化建设等手段来创造条件。三是在税收执法监管中更加讲“温度”。《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税收执法要“宽严相济、法理相融”“准确把握一般涉税违法与涉税犯罪的界限,做到依法处置、罚当其责”,要研究推广“首违不罚”清单制度。这种执法理念与新世纪初的“严格税收执法”理念相比无疑是重大变化。总体来看,现在的税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政府协调兼顾各阶层、各类市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利益诉求的功能。

(三)始终坚持税收改革道路的中国特色,发挥好税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西方世界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围绕征税权进行的政治斗争曾经是重要推动力量。熊彼特认为,“社会结构决定了税收的种类和水平,但税收一经产生,就成为一把可以操作的手柄”“各种社会力量都能握住这一手柄,用以改变社会结构”^①。二战后,西方劳工阶层凭借选举权的普及和选票规模优势,推动了福利国家的诞生以及税率累进性的增强,在有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一度高达70%以上。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和资本强流动性特征,掌握资本的精英阶层取得了相对于劳工阶层的议价优势。一方面是劳工阶层的选票规模,一方面是精英阶层“用脚投票”的能力,在拉锯式的议会政治斗争中,西方主要国家的税收政策总体上呈现出“左右摇摆,减税为主”的特征。左倾社会民主主义势

力上台后,会倾向于推行以增税为主的经济政策;右倾保守主义势力上台后,则倾向于推行以减税为基调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资本持有者在议价能力上的相对优势,减税往往比增税更容易成功。在美国,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先后经历了增税、减税、再增税、再减税的周期性经济政策变化。拜登上台后,增税又成为其主要经济方案选择之一。

相比之下,我国由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经济政策走向具有延续性和可持续性,能够给市场主体以相对稳定的未来预期。新世纪以来我国税收政策,减税基调逐渐增强。这表面上与西方国家减税为主的经济政策走向相似,但其实质与西方国家“翻烧饼”式的政策变迁明显不同。我国的减税政策实质上是市场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我国企业税收负担的形成原因看,其首先与计划经济时期政企关系遗留以及渐进式改革策略有关。“利改税”后大型国营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55%,小型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按照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从当时税率设计原则来看,参照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利润上缴水平。1994年大规模税制改革时,“总体税收负担基本保持现有水平”(刘佐,2001:301-303)被作为一项原则加以贯彻。也就是说,在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税制改革主要表现为“新税”代“旧税”或者“费改税”,一般很少创设真正的“新税”,税收负担在税改过程中保持稳定以满足财政需要。然后,随着国有企业改制以及环保法、劳动法等法律硬约束的形成,市场主体过重的税费负担逐渐凸显。可见,我国企业和纳税人的税费负担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治理制度完善过程而逐渐产生并强化的(武靖国,2019)。要解决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首要措施是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减税降费、征管改革不是社会阶层矛盾对立的结果,而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需要。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税收思想发展以及税收改革进程,能够清晰发现深化改革的“中国道路”以及国家治理的“中国模式”之基本特征,即由具有高度学习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①引自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见于《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刘守刚,刘雪梅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

由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①。在未来的税收改革中,坚持党对税收工作的领导,是决定改革能否以一贯之,取得最终成功的首要因素。我国税收要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新常态下逆周期调节的功能,发挥好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需要面对一系列繁重的改革使命,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事关亿万自然人切身利益,需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深度调整甚至重塑。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一改革任务不可能完成。

四、结论与展望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税收思想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受政党性质和根本目标所决定,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的内核即“人民税收”一直以来没有变化,税收功能设定一直服从、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在不同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税收职能定位的侧重点不断发生调整。总体来看,税收职能定位大致经历了“革命税收”“利税并行”“经济税收”等几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社会整合方面的新思路新取向,税收功能定位得到了前未所有的拓展,税收在继续发挥其财政筹集、经济调节等固有作用的同时,需要“深化嵌入社会的程度”(吕冰洋,张兆强,2020),为构建有机性、共识性和包容性社会发挥自身作用,从而,党的税收理念具备了更浓厚的“全方位”色彩。

在这里,可以用“从革命到调谐”来比喻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百年变迁的历程。在税收的革命色彩逐渐淡去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更成熟的把握,税收政策调整的目标越来越多地具备了普惠性、包容性特征,越来越多地承认、尊重、保障、兼顾各个阶层、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益诉求。“调谐”是一个物理词汇,是指调节一个振荡电路的频率使它与另一个正在发生振荡的振荡电

路(或电磁波)发生谐振。改革开放以来,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调节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运用税收工具来实现治国理政目标的思路、方式和手段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和专业化。运用税收工具进行调控调节的重要目的,就是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到一个“频道”上,将各种社会力量的行动调整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强国的同一目标上,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同频共振。“从革命到调谐”其实也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整合的成功秘诀,即其有理想、有能力构建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阶层、群体、族群、区域间利益协商、交流、交往平台。

与其他政治或经济范畴相比,税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税收涉及财产权利的转移,是主要的再分配手段,税收征收过程顺利与否,与纳税人对征税合法性的心理认同高度相关。因此,在税收立法过程中更应该广泛聚拢民意,倾听各阶层群体诉求;在税收执法过程中更应该坚持包容审慎原则,促进依法治税与公平竞争;在税收治理过程中更应该突出社会共治,增强社会各界对税收事务的参与度与认同度。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国家治理需要来看,税收事业各个环节都要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以争取社会最大公约数。当前我国社会整合的焦点、利益协调的难点、央地关系的重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点,集中到了“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直接税制改革上。直接税改革能否取得真正成功,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个体关系的深度调整,亦取决于一系列深化改革的“硬骨头”能否被突破。

从理论和逻辑上讲,即使利益冲突再激烈,只要有足够的沟通协商,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也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具体的利益分配面前通过充分沟通协调来取得一致性的共识是可能的,关键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保持开放性心态,尊重各阶层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在不间断的充分交流中来形成思想共识、利益相容与情感归属。从这个角度看,税收思想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一个系统性纽带。税收思想的不断发展完善,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不断进步的重要脉络。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4.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1931、1949)[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11] 刘佐.中国税制五十年(1949-1999)[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 [12] 梁尚敏,陈光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简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
- [13] 冯田夫,李伟光.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 [14]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法律出版社,2011.
- [15] 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M].中华

书局,2019.

- [16] 陈志让.军绅政权[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7]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1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1986.
- [19] 李诚.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及路径启示——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6):97-104.
- [20] 刘佐.中共税收政策的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作[J].经济研究参考,2011(55):70-87.
- [21] 邓力平.中国特色“人民税收”理念新论[J].东南学术,2020(04):126-135+247.
- [22] 顾小璐,陈晓东.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J].中州学刊,2020(11):65-69.
- [23] 吕冰洋,张兆强.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从嵌入经济到嵌入社会[J].社会学研究,2020(4):152-173.
- [24] 宁洁,韩桥生.以人民为中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6):186-194.
- [25] 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17(4):33-46.
- [26] 武靖国.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国家治理意蕴[J].税收研究资料,2019(4):21-25.

【责任编辑 寇明凤】

(上接第27页)

果,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财政理论的经验、勇气和自信也为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P3.
- [2]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J].新文学史料,1979(3).
-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P501-502,P299-353.
- [4] 柯华.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P57-58.
- [5] 吴敏超.《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与左翼经济学家[J].近代史研究,2009(4).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P174.
- [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60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P176,P209.
- [9]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467.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P895.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P353.
- [12] 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288-289.
-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1429.
- [14] 程思远.政坛回忆录[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P158.
- [15]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N].新华日报,1946-6-14.
-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29.

【责任编辑 成丹】